

孙正聿哲学文集

◎ 孙正聿 著

哲学通论

(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孙正聿哲学文集

哲学通论

(下)

◎ 孙正聿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五章 哲学的派别冲突

第一节 考察哲学派别斗争的方法论 / 363

- 一、哲学的派别冲突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 / 363
- 二、用两个标准考察哲学理论 / 364
- 三、反思现代哲学的派别冲突 / 368

第二节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 371

- 一、“本原”问题 / 371
- 二、“认识路线”问题 / 376
- 三、哲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 383
- 四、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 / 391

第三节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 398

- 一、“思维方式”问题 / 398
- 二、辩证法的概念解析 / 402
- 三、辩证法的自在性与自为性 / 410

四、辩证法的批判性本质 / 418

第四节 经验论与唯理论 / 426

一、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 / 426

二、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分歧 / 431

三、表象与思想的矛盾运动 / 440

第五节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 / 451

一、科学主义的概念解析 / 451

二、人本主义的概念解析 / 456

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与融合 / 460

四、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 465

五、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 468

第六章 哲学的历史演进

第一节 哲学历史演进的多重透视 / 473

一、哲学发展史的涵义 / 473

二、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透视哲学史 / 477

三、从人类存在的历史形态透视哲学史 / 479

四、从哲学寻求崇高的进程透视哲学史 / 484

第二节 哲学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 / 488

一、自我追问和自我扬弃的历史 / 488

二、哲学问题自我相关和哲学原则解释循环的超越 / 491

第三节 哲学的现代革命和当代趋向 / 494

一、现代哲学的理论前提 / 494

二、“实践转向”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 / 501

三、“语言转向”与现代西方哲学 / 510

四、现代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 519

五、当代中国的哲学主流 / 526

第七章 哲学的修养与创造

第一节 哲学的品格 / 533

一、向上的兼容性：深厚的历史感 / 533

二、时代的容涵性：强烈的现实感 / 537

三、理论的系统性：巨大的逻辑感 / 542

四、思想的开放性：博大的境界感 / 548

第二节 哲学思维的训练 / 551

一、哲学的求真态度 / 551

二、哲学的反思取向 / 556

三、哲学的批判精神 / 559

四、哲学的创新意识 / 561

五、哲学的分析方式 / 565

六、哲学的辩证智慧 / 568

第三节 哲学态度的培养 / 572

一、高举远慕的心态 / 572

二、慎思明辨的理性 / 577

三、永无止境的求索 / 581

附录1 关于开设“哲学通论”课的思考 / 586

附录2 《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 / 589

附录3 高清海：培养创造性的头脑 / 606

附录4 《哲学通论》后记 / 611

附录5 《哲学导论》后记 / 615

附录6 《简明哲学通论》的前言和后记 / 617

附录7 吕国忱：哲学改革中的探新 / 620

附录8 沈亚生：探索我国哲学教育改革的新思路 / 624

附录9 丛大川：“哲学是什么”的当代追问 / 629

附录10 哲思永无止境 / 639

附录11 方觉浅：关于《哲学通论》的评论（节录） / 650

附录12 哲学反思之路 / 653

附录13 教学要有魅力 / 668

附录14 “教学是快乐的” / 676

附录 15 王占仁：师者之尊 / 681

附录 16 张玉来：掌声为哲学课喝彩 / 684

后 记 / 688

第五章 哲学的派别冲突

哲学的首要的突出特征，在于它的坚韧不拔的自我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因此，哲学的发展史，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哲学自我追问的发展史；哲学自我追问的发展史，在其表现形态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相互冲突、相互批判的历史。探索哲学的派别性，以及哲学在派别冲突中所实现的理论发展，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以及深化对哲学发展规律的认识，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节 考察哲学派别斗争的方法论

一、哲学的派别冲突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

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的派别冲突是同人类的存在方式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对哲学派别斗争的理解中，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哲学的自我追问，是表征着人类的自我追问；哲学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是表征着人类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哲学的派别冲突，是哲学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的理论表现，因而哲学的派别冲突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存在的矛盾性，以及人们对自身存在的矛盾性的理解的非一致性。

在对哲学派别斗争的理解中，我们还应该看到：无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还是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或者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

它们作为哲学层面的理论冲突，并非仅仅是哲学派别之间的思想冲突，而是深刻地表征着人类自身存在的矛盾性。其中，哲学的主要派别冲突，集中地表征着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与对自然的超越性的矛盾，人类的感性存在与理性追求的冲突，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冲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冲突，如此等等。

因此，在对哲学派别斗争的理解中，我们需要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去解释哲学理论的冲突，而不是把这些冲突单纯地视为哲学的自我冲突；同样，我们需要从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去揭示哲学理论冲突的历史演化，而不是把哲学的理论冲突视为徒然的“厮杀的战场”；因此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哲学的派别冲突，把哲学的派别冲突合理地理解为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

二、用两个标准考察哲学理论

哲学的派别冲突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冲突既具有不容否认的派别性，又具有不应忽视的层次性。哲学的派别冲突总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哲学在层次上的递进又总是在派别冲突中实现的。因此，我们需要用派别性和层次性这两个标准去考察哲学理论及其派别冲突。

把全部哲学理论区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等等，是运用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考察哲学理论所得出的基本认识。没有这种基本认识，就会模糊甚至混淆哲学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的两条认识路线以及其他重大的原则界限，难以自觉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仅仅用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去考察全部哲学理论，却会严重地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在哲学发展进程的每个环节上所进行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等等的斗争，都以先前的哲学成果为基础，都聚焦于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提出的新问题，都孕育着新的思维方式的萌芽。因此，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水平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等等的斗争；特定时代的唯物论总是同自己时代的唯心论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

展的；离开特定时代水平的哲学斗争，就会把哲学的派别斗争简单化、抽象化和庸俗化，把丰富多彩并且不断深化的哲学思想变成某些僵死凝固的教条，从而在实际上否认了哲学的进步。

哲学史表明，正是由于唯物论哲学是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唯心论大师相斗争，才产生了德谟克利特、培根、斯宾诺莎、洛克、狄德罗、费尔巴哈乃至马克思这样的唯物论巨人。如果把唯心论大师简单化、庸俗化甚至是漫画化，唯物论巨人岂不成了与风车搏斗的堂吉珂德先生！

哲学史还表明，哲学不仅是在不同派别的哲学斗争中发展的，而且是在不同水平的哲学斗争中前进的。其中，包括不同水平的唯物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不同水平的唯心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都是如此。正是由于不仅着眼于哲学派别之间的斗争，而且立足于哲学发展的逻辑，列宁才提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①，并在这个意义上常常把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相提并论，如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等等。^②

黑格尔曾经形象化地提出，如果在哲学史中所看出的只是分歧的思想和多样的哲学彼此相互反对、互相矛盾、互相推翻，“全部哲学史这样就成了一个战场，充满着死人的骨骼，每一个杀死了另一个，并且埋葬了另一个”^③，哲学本身就没有进步可言，哲学史也就不是发展史。多年来，我们习惯于仅仅用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去看待哲学史和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② 同上，第308页。

③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22页。

考察哲学理论，并把运用这个标准所划分的哲学派别简单地归结为进步与反动的对立，结果往往是从两个方面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其一，虽然把唯物主义哲学分为古代的朴素唯物论、近代的机械的和形而上学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由于简单化地把全部唯物论哲学归结为进步的哲学，因而从来没有像批判唯心论哲学那样去批判旧唯物论，以至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全部旧唯物论的原则区别，在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混同于旧唯物论；其二，由于把唯心论哲学简单化地归结为反动的哲学，就否认了它的历史发展，拒绝对它的具体的、深入的考察，无视现代唯心论哲学的新特点和新成果，把唯心论哲学抽象化和漫画化，以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堂吉诃德先生与风车搏斗的可笑境地。这两方面的共同后果，则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它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及其随着时代发展而自我更新的生命力，把它变成了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抽象的唯物论，甚至变成了某些空洞而凝固的教条。

因此，如果我们不仅承认哲学始终存在着各种派别之间的斗争，而且承认这种斗争是哲学自我否定的发展进程，那么，我们在肯定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和运用另一个标准——区分哲学水平的标准——去考察全部哲学理论和哲学派别斗争。

区分哲学水平的标准同区别科学水平的标准具有一致性：其一，先进的哲学也必须具有向上的兼容性，能够对先前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给予理论解释；其二，先进的哲学也必须具有论域的超越性，能够提出和回答先前哲学所没有提出或没有解决的问题。

区分哲学水平的标准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其一，反思层次的跃迁。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中，哲学始终是一种“对思想的思想”、“对认识的认识”，即人类思维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哲学的水平总是同它所反思的思想（知识、科学等等）的水平密不可分。人类思想的发展，促使哲学不断进入更深层次的反思。比如，哲学从对经

验常识的反思而进入对科学理论的反思，就引起哲学反思层次的重大飞跃。而科学从近代水平到现代水平的跃升，则导致哲学反思层次新的跃迁。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现实联系的间接性越高、中介环节越多，哲学反思的水平也越深刻。反之，越是直接面对经验对象的哲学，其反思水平越低下。如果我们从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研究对象上进行比较研究，这个问题将是十分清楚的。

其二，传统问题的深化。哲学理论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因此，哲学问题总是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的：一方面，老问题以胚芽的形态蕴含着新问题，研究和回答新问题总要反省老问题；另一方面，新问题以成熟的形态展开了老问题，解决老问题又有赖于探索新问题。这种新、老问题的自我相关和自我缠绕，使哲学总是仿佛向旧东西的回复，实际上则构成一系列螺旋式上升的圆圈。当代哲学家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 1910— ）认为，“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①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自由与必然的问题，真善美的问题，理想与现实的问题，是人类的永恒的问题，因而也是哲学的万古常新的问题。哲学的进步，就在于从新的视角出发，以新的反思对象为基础，对这些万古常新的哲学问题作出自己时代水平的反思，从而为人们的理想、信念和行为提供时代水平的最高支撑点。在这个意义上，能以新的视角、新的材料和新的手段去研究传统问题，并使之获得自己的时代水平的回答，是衡量哲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三，思维方式的更新。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所提供给人类的不是某种在经验层次上加以证明的知识，也不是某种变革具体

^①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对象的技能，而是观察现实和接近现实的思考方式。新的思考方式的形成，起码需要以下三个条件：（1）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2）综合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科学、艺术、伦理和宗教等等——的全部成果；（3）批判已有的认识成果及其思考方式。历史感、综合性和批判性，以及由这三者所决定的创造性，是衡量哲学水平的根本标准。它把反思层次的跃迁和传统问题的深化熔铸于思维方式的更新。

区分哲学水平的标准表明：其一，哲学的历史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在总体上是前进的发展的，后来的哲学优越于先前的哲学，我们要从每个时代的哲学水平出发去考察哲学理论，而不能用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去取代区分哲学水平的标准；其二，哲学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同一时代的哲学可能处于哲学发展的不同水平上，我们的目标是促使低水平的哲学升华为高水平的哲学，而绝不是相反；其三，由于思维方式的陈腐和僵化，常常出现用低水平的哲学去理解高水平的哲学，从而把高水平的哲学描述为低水平的哲学的现象。以旧唯物论的思维方式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规定哲学的对象、体系、功能和使命，去裁判整个现代哲学，是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和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之所以在肯定用派别冲突的标准去考察哲学的同时，特别地强调用不同水平的标准去考察哲学，其目的就在于以两个标准的思想去推进哲学的发展。

三、反思现代哲学的派别冲突

现代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运用划分哲学派别和区分哲学水平的两个标准去考察现代哲学，把握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趋向，是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

传统哲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从对立的两极——思维或存在——出发去寻求世界的统一性和解释世界的统一性原理。仅就近代西方哲学而言，从“我思”、“感知”、“自我”、“绝对”出发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从“自然”、“物质”、“人的感性存在”出发的唯物主义哲学，

都是如此。由于这种水平的唯心论哲学和唯物论哲学分别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去寻求解释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它们所能达到的也只是对存在的（自然的）统一性或精神的（意识的）统一性的解释，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真与善、人与世界都仍然是相互隔绝、相互对立的存在。这样，近代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也成为片面夸大的两极性理论。对于它们各自的局限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作出了极其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但是，黑格尔以后的现代哲学，以黑格尔所揭示给哲学的新对象——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的概念世界——为契机，则放弃了从思维或存在的两极出发去寻求世界“本体”的思维方式，致力于探索把思维和存在联系起来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些中介环节作为哲学反思的真实对象。这是反思层次的重大跃迁，是传统问题的空前深化，是思维方式的深刻革命。它标志着哲学水平的巨大飞跃。

以“实践”这个中介环节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最高成果，也是人类迄今所达到的最高的哲学思维方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就是从实践这个中介环节出发，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和变革人与世界的关系。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以实践为核心的中介环节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存在。科学、艺术、语言、符号和意义等等，都是主观客观化和客观主观化的中介环节，都以扬弃的形式融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于一体，自身都具有主观与客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思维与存在相互融合、相互过渡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以“科学”为对象的现代科学哲学、以“语言”为对象的现代语言分析哲学、以“意义”为对象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以“符号”为对象的现代哲学文化学等等，都是实践哲学的展开和具体化，即都是实践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哲学是与实践哲学处于同一时代水平的现代哲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不能拒斥这些哲学及其研究成果，而只能通过研究这些哲学和吸收它们的成果来发展实践哲学。

但是，现代西方哲学在对“科学”、“艺术”、“语言”、“意义”、“符号”等等的研究中，往往由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方式而片面地夸大了某个中介环节，并从这个被片面夸大的中介环节出发去构造整个哲学体系，以至像他们所猛烈抨击过的黑格尔一样滑进了唯心主义。这就需要在重视区分哲学水平的标准的同时，坚持划分哲学派别标准，同唯心主义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我们又必须时时注意这是以新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高级层次上的斗争。如果离开现代哲学所具有的显著的“一致性”，用传统哲学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去看待现代的哲学斗争，就会一方面是极为可笑地与幻想的论敌即抽象的唯心主义进行搏斗，另一方面则是十分可悲地使自己倒退回旧唯物论的水平而裹足不前。

因此，在探讨哲学派别冲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哲学的派别冲突同人类存在的矛盾性联系起来，需要用两个标准去衡量哲学的派别冲突，尤其是需要从现代哲学的时代特征出发去深化对现代哲学派别斗争的理解，在当代的水平上推进哲学的发展。

第二节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一、“本原”问题

关于哲学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通常作出如下解释：“人们以总体方式把握世界，首先遇到的就是世界的本质问题，即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二者归根到底谁先谁后、谁依赖谁、谁决定谁的问题。”“对于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只有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两种，哲学家也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凡是主张物质自然界是本原，物质第一性、意识或精神是第二性的，都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凡是断言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意识或精神是第一性的，而物质是第二性、从而归根结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都属于唯心主义阵营。”^①

这种通常解释，主要是源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有关论述。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引述恩格斯的这些论述，首先是关于“本原”问题的论述。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② 在这里，关于“本原”问题，恩格斯明确指出是“精神”和“自然界”谁为“本原”，“本原”问题的内容是“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本原”问题，只是“精神”和“自

^① 李秀林等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然界”孰先孰后的问题，也就是纯粹的“时间先在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只能是实证科学的，而不能是哲学反思的。就是说，我们只能是用自然演化和动物演化以及人类生成的科学理论来说明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因而人的精神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哲学无法独立地证明这个结论（尽管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问题及其结论却具有特别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这个问题是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里所使用的“思维”和“存在”，具有特定的涵义，就是“精神”和“自然界”；这里所说的“地位问题”，也具有特定的涵义，就是“谁为本原”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是作为哲学反思的常识基础或科学前提而存在的，它规定着哲学家在何种基础上去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对自然界的地位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构成了“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

需要认真考虑的是，这个“最高问题”一旦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它就不再是需要科学来回答的“时间先在性”问题，而是哲学所追问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我们断言精神与自然界孰为本原的根据是什么？宗教与科学各以何种尺度或标准来作出它们的断言？应该怎样看待和评价宗教与科学？这就是思想自我反思中的哲学问题。

其二，我们再来引述恩格斯关于“两大阵营”问题的论述。恩格斯说，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本原”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对此，恩格斯又特别强调地补充说：“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②

“精神”和“自然界”谁为“本原”的问题，根源于人类的产生。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